

# 中国20年内如何赶超美国

近年来,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道路似乎越走越难,而一个崛起中的中国正在不断赶上。中国到底会不会超越美国?何时能超越美国?成为萦绕在很多人心头的疑问。

笔者认为,从经济增速、增长原动力、人才和创新等方面来看,中国在20年内必将全面超越美国。

## 目标一: 经济体量达美国2倍 为什么要定在20年?

首先从经济体量开始算,按照官方汇率折算,中国的GDP(美元计算)现在是美国的70%不到,但官方汇率肯定是低估了中国的经济体量,这一点是毫无疑问。另外一种算法就是购买力平价(PPP),这个数字世行和IMF的稍微有点区别,但按照这两个购买力平价数据计算的中国GDP都已经在2015年与美国持平了。

中国每一年的增长率都比美国要快,而美国经济危机以后的长期增长率很可能在3%以下。如果以世行2014年底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和美国打平为基准,再往前看,只要中国的平均年增长率是美国的两倍或更高(也就是说中国年增长率是6%或更高,而美国年增长率在3%或者更低)的话,到2035年中国的经济体量,按照PPP计算,就是美国的2倍了。

不过,经济总量以平价购买力计算也存在争议,有人说可能高估了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会高估呢?比如实际通胀率以及某些行业的成本被低估等。

在笔者看来,即使现在在中国经济总量还不如美国,两者之间的差距应该也是非常小的。总而言之,20年内中国经济体量是美国的2倍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 目标二: 人均GDP相对美国翻番

当然经济体量只是一个方面,其他比如人均GDP。

目前如果按照官方汇率,中国的人均GDP还比较低,为8000美元,美国人均GDP是5.5万美元,差距还很大。如果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大概是14000美元,全球排名在79到85位,应该说刚刚跨入中等收入国家,按此计算中国的人均GDP大概是美国的1/4(PPP计算方法以美元为基准,所以美国的PPP值不变)。从20年的跨度来看,如果中国的人均GDP相对美国翻一番,也就是说20年后中国的人均达到美国的一半,而中国的总量至少是美国的2倍,如果能到这样的人均水平,中国绝对就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了。

再以韩国为例子,1950年韩国的人均GDP是非洲水平,也就是处在世界最穷国家之列,60年后,以购买力平价计算,韩国的人均GDP已经和法国一样了,它用60年从最穷国家跨入到最富国家的行列。这也应该是我们中国下一步发展的目标: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跨入世界富裕国家之列。

我国改革开放刚开始的1980年,GDP不到美国的10%,花了不到35年现在已经跟美国一样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经济发展奇迹。如果再花20年我国的经济体量是美国的2倍、人均是它的一半,这将同样是非常伟大的20年。

## 目标三: 挖掘内需原动力促增长

那么,中国是否会有重蹈日本“逝去20年”(1985年,美、日、德、英、法签署“广场协议”启动了日本经济的由盛转衰,不断升值日元、大量的热钱和有利的杠杆投资机会带来空前的资产泡沫,随后采取的紧缩性措施

使经济泡沫破灭)覆辙的可能?

笔者认为,我们跟日本不一样,我们增长的原动力来自于内需,具体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是亿万中国老百姓要过上更富裕更好的日子。

改革开放30年完成的伟大业绩就是让3亿到6亿人脱贫,接下来的30年如果这中间很多人的人均收入再翻番,我们就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的企业、服务只要是满足这几亿人消费方面的需求,中国的经济就可以持续高速增长,这个就是所谓的内需拉动的发展。

在这一点上,我国相对印度、俄罗斯等其他新兴经济体也是有优势的:印度的制造业规模很小,因为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构架没搭起来,而俄罗斯的经济非常单一,连很多日常用品也必须依靠进口。我国有非常完整的制造业,也有足够多的服务业,而且发展得非常快。

自从英国脱欧以后,尤其现在特朗普即将上台,美国以及整个发达世界对我国的出口是不利的。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今后三五年的贸易环境可能不会那么好。但这也是个机会,让我们的经济更快转型成为内需,尤其消费、服务业和科技拉动。短期内出口虽然还很重要,但我们已经不再依赖出口拉动增长了。

反观美国,已经老大自居多年,所谓大美国主义的经济含义就是美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别国照搬其经验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它内生的创新动力可能是有限的。而中国仍然处于高速发展和变化之中,可以借鉴美国和别的很多国家的经验,最终可以追上并且赶超。

## 目标四: 完善人才政策吸引回流

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笔者认为有两方面是很重要的:一是资源的配置;二



是如何把人的资源用好。

从资源调配来看,我国的机制肯定是有优于美国方面的。美国现行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不作为,两党均衡而政党可以被持极端意见的官员绑架,导致政府什么也做不了。几年前美国政府由于无法达成债务水平的协议就关门了,导致全世界的债务以及金融市场陷入混乱和僵局。

反观我国,很多时候以政府为核心可以统筹和调动资源去做一些事,比如说高铁、航天、基础建设、基础到高等教育等,这些都是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和民生的。

从人的资源利用来看,衡量一个制度好坏的关键是能否把最合适的人选放在最合适的岗位上。人才与岗位匹配好了,需要合理的激励机制,同时也要有监督机制。如果这些都做好了,这就是个好制度。如此看来,我们已走了跟美国不一样的路。

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必须要靠创新和人才。笔者认为,在这方面我国也可以全面

赶超美国。

目前,我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资量很大,这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人才政策也很重要。美国现在一流大学读理工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中,应该2/3或者更多的学生不是生在美国的,很多是中国学生。笔者认为,中国其实不用去挖空心思抢外国人才,只要给从中国出去的能人创造好的条件,吸引他们回国。

实际上,中国如果能把生活条件,包括医疗、教育、空气质量等再进一步提升,相信回来的人会更多。不但是中国人,外国人也会来的,现在美国好多中上层家庭的孩子学中文的很多,因为他们看到中国有机会。只要生活环境有保障,中国有机会,人才就会回来。

(作者系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钱军,本文由国际金融报记者赵怡雯根据其关于“中国能否在20年内全面赶超美国”这一话题的公开辩论整理而成。)



●如果宏观政策比较得当,供给侧改革能有实质性进展,今后一两年内,经济触底是大概率事件。经济触底后,能够在5-10年内稳定在中高速增长平台。

●在一些国有企业比重较大的产业中,依托国有上市公司开展产业整合,推动更多的国有企业改革成为混合所有制的公众公司,提高国有资本证券化水平,既可以推动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又可以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

●从经济增长到全面发展,新时期的结构变迁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发展也不只是经济建设,而是“五位一体”。这需要提升整体思维,超越经济思维,树立治理思维。建立以整体观为核心,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形成合力的政策体系是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途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勇、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等专家4日在参加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改革论坛”时就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以及下一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向前推进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中国经济新动能蕴含在六大领域

中国经济经过六年的回调以后,已经接近底部。从需求侧来说,主要是三大需求,出口、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已经落地或者即将落地,其中前两项已经见底,而房地产的历史性拐点已经出现。今年一季度后,一线城市房价快速上涨拉动的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回升是一个短期现象,大概半年或者一年后,房地产投资会回归常态,这种常态就是低速、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从供给侧来说,两个最重要的指标,PPI已经由负转正,工业企业利润已经开始恢复增长。由此可以判断,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

经济接近底部与触底是两个概念,如果宏观政策比较得当,供给侧改革能有实质性进展,今后一两年内,经济触底是大概率事件。经济触底后,能够在5-10年内稳定在中高速增长平台。但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就需要促进新动能的发力。新动能可能出现在六大领域。

第一,要素市场扭曲导致的低效率领域的开放和竞争。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等产业在内的行政性垄断比较突出的基础产业领域应进行改革,这些领域投资已经不少了,但真正高效率的投资并不多,

这些领域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潜力很大,这是中国最大降成本的地方,可以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生产和运营的成本。

第二,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农村集体土地改革,包括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的改革准备朝前推,但现在看来,进展不如预期,这件事不能再往下拖了。现在一线城市房价高企,而大量存在的小产权房没有放开。这个事虽然敏感,但是回避不了,如果通过某种政策清理,比如该交的税交了,该交的费交了,让小产权房能够名正言顺地进入流通,如果农村集体土地能够和国有土地一样同价同权进入市场流通,一线城市的房价还会这么高吗?

此外,如果北京周边的农村土地改革不往前推进,人口均衡的分布难以实现,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也难以实现。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改革对城乡协调发展特别是大都市圈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加都至关重要。

第三,要特别关注经济下行过程中的产业分化。最近几年出现的地区分化、行业分化、企业分化包含了很重要的信息,这是企业转型升级、创新的信号。过去我们讲了很多年要转型升级,为什么转不了?因为还不到时候,现在不转不行了,所以转型升级创新都是大形势下被逼出来的。事实上,有些地方还在保护那些落后的、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比如企业购并过程中,把好的和坏的捏在一起,差的企业一般是不行了,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好的企业可能就被拖垮了。

第四,现代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物流、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还有像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社会性服务业,发展潜力都很大。特别是通过对外开放带动对内开放,大有文章可做。

第五,新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实体经济,这些年进展非常快,提升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与现行的管理制度,特别是在监管制度之间产生了矛盾冲突,其中网约车就是明显的例子。现行监管体系从监管理念、能力、水平和方式上需要转变,实现在创新中监管,在监管中创新。

第六,前沿性创新领域,比如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我国在这些领域与国际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但基础研究、大学教育、自由探索的体制机制仍有较大差距,这个短板不补上,就没有成为真正创新型大国的

# 中国经济接近底部 增长还需六大动能

长期、可持续的基础。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勇: “去产能”可以企业兼并重组为主要方式

目前我国许多制造业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化解产能过剩将成为未来2-3年甚至更长时间经济工作的重点。但是简单的关闭过剩产能又会导致地方政府面临财政收入减少、债务违约事件增多、大规模失业等问题,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我国产能过剩行业普遍存在产业集中度较低、企业规模偏小、竞争混乱等问题,这与美国早年的产业发展状况极为相似。市场集中度低与产能过剩一样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美国早期产业发展经验,提高产业集中度,可以使企业的市场行为更加理性,市场分工更加明确,在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的博弈中更具主动性,具有更大的议价空间和议价能力。为此建议:

第一,去产能以企业兼并重组为主要方式,实行以“行业龙头企业 and 金融机构共同主导产业整合”的基本运作模式,提高产业集中度。

这里所说的行业龙头企业,可以是国有企业,也可以是民营企业;金融机构则可包括原来就与该产业的企业有业务往来的银行与信托机构,也可以包括专业于兼并重组的股权投资基金;金融机构与股东也可以“债转股”,在一定时期内作为股东参与企业的活动,以后再择机退出。通过行业龙头和金融机构共同主导产业内企业的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推动产能过剩行业“供给侧改革”,同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二,在部分产业中以国有企业为抓手,加快推进产业整合重组,同时促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目前,产能过剩较为严重的钢铁、煤炭、水泥、石化、有色金属等行业多为国有企业较为密集的行业。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加之地方政府扭曲的政绩观、财政预算的软约束、模糊的土地产权,导致国有企业在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目的和使命之一就是弥补市场失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抓手。因此,在一些国有企业比重较大的产业中,依托国有上市公司开展产业整合,将零散的国有资本和其他社会资本集中到上市公司和优势企业,推动更多的国有企业改革成为混合所有制的公众公司,提高国有资本证券化水平,既可以推动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又可以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还可以防止地方政府通过干预国有企业而引发产能过剩。

第三,完善资本市场功能,扫清产业资本运作障碍。

资本市场对企业发展意义重大,股票市场在企业并购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完善,严重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当前实体经济下行,迫切需要产业重组的背景下,完善资本市场功能尤为迫切。中国证监会对企业并购重组的监管非常严格,手续非常复杂,审批时间非常长,导致企业并购重组比上市还难。证券监管部门需要进一步减政放权,减少审批事项,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做好

服务上来。

第四,社保政策托底,为“去产能”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

用企业重组的方式去产能,企业破产较少,产生的失业也较少,但仍然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职工下岗。企业破产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是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政府需要做的是最大限度地缓解因此所造成的社会矛盾。首先,国家可以通过完善相关法律,保护破产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其次,可以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成立破产企业职工补偿引导基金,引入社会资本实现商业化运作,国家为这些基金的运作提供优惠条件。最后,畅通政府、行业协会、企业、职工的沟通渠道,建立微观主体的“多边谈判”机制,通过谈判解决破产补偿问题。

##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去产能”要发挥好财政与金融合力

我国产能过剩顽疾的成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的竞争性行业市场化进程滞后,国有经济退出机制不健全。一方面,政府希望国有经济在这类产业中保持一定的“较强影响力”,政府在这类产业中保留了大量管制性、干预性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倾向于支持国有大型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类大型国有企业资本规模大、人员多,政府不希望大型企业破产退出造成经济下滑、失业加剧、财政收入锐减,故而一些落后的国有企业难以退出市场。

第二,中央、地方对产能过剩行业共同施加有缺陷的产能管制政策,造成产能无序扩张。采用行政管制手段治理产能过剩,政策部门必须对未来供需形势、未来市场需求规模与需求结构进行准确预测,但是这种误判恰恰成为政府失灵的重要根源。

第三,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是体制性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土地、资本,还是水、电、气等,要素资源配置的权利仍有很大部分掌控在政府手中,价格双轨制、产权模糊不清等现状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第四,许多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有可能进一步扭曲产能过剩问题,导致市场机制失灵。根据调研,企业自身虽也有压减产能的意愿,但又担心全国缺乏统一部署,其他企业不压减,造成“谁先动谁被动”的局面,陷入典型的“囚徒困境”,市场调节机制失灵。

地方政府出于对财政收入、就业以及经济总量的考虑,倾向于保护规模大、高产能的产业,扩大规模和产能仍然是企业的主要选择。针对产能的财政补贴加快了行业产能的爆发式增长,造成了行业产能的过剩以及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和价格战;使得本应获得政府大力支持的研发环节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难以突破核心技术。这种逻辑促使产能不断扩大,陷入产能过剩顽疾的政策怪圈。

从经济增长到全面发展,新时期的结构变迁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发展也不只是经济建设,而是“五位一体”。这需要提升整体思维,超越经济思维,树立治理思维。建立以整体观为核心,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形成合力的政策体系是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途径。

第一,财税可适当提供间接的去产能补贴。补贴重点放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失业保险的统筹接续以及职工再就业培训,并加大对社会性职业培训机构的税收优惠。

第二,发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引导作用,并加大对社会性职业培训机构的税收优惠。严禁对违规项目提供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和直接融资;对主动化解过剩产能和进行产业整合的企业给予融资支持。

第三,完善不良资产处置机制。淘汰过剩产能的过程中,商业银行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不良率上升甚至不良资产集中爆发的问题。针对去产能重点地区,适度降低资产管理行业准入,丰富和创新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继续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地方财政部门可推动成立专门的行业重组金融公司,集中处置不良资产;地方政府建立企业金融债务重组和不良资产处置协调机制。(金辉)

## 国家鼓励发展的 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录公布 浙江丰利废塑料 复合材料回收处理 成套装备入选

日前,浙江省经信委发布了《浙江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重点领域(2015)》的通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丰利粉碎设备有限公司研发的“废塑料复合材料回收处理成套设备及综合利用技术装备”入选其中,列为第五类大型环保、节能及资源综合利用设备,成为重点发展的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装备。这是该装备继入选《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录(2014年版)》之后的又一殊荣。

废塑料回收再利用是典型的循环经济产业,当前我国塑料废弃物呈现逐年增加态势。

此次入选的项目是浙江丰利在之前完成承担的国家重大产业技术开发专项“废塑料复合材料粉体法综合利用技术开发”课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开发而成的新装备。突破了粉体化回收废塑料技术(不会改变化学成分,造成二次环境污染);高压静电分选技术;智能化自动控制技术和贵金属提取技术等关键技术,从而有效破解铝塑复合膜、铝塑板、塑料复合膜、光缆电缆等复合制品的回收处理这一亟待解决的社会化问题,攻克了国内无法用物理方法来解决废塑料复合材料回收利用的技术难题,实现资源再生综合利用,为废塑料复合材料回收利用提供强有力技术支撑的绿色环保装备。

咨询热线:0575-83105888、83100888、83185888、83183618 网址:www.zjfengli.com 邮箱:fengli@zjfengli.cn